

浙江伦理学论坛
Ⅲ

ZHEJIANG
ETHICS FORUM Ⅲ

主 编 陈寿灿
副主编 郑根成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序

伦理学以道德为研究对象,但这绝不意味着伦理学只研究关于道德的理论而不涉及其他。事实上,当伦理学家们说“伦理学以道德为研究对象”时,伦理学家们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其一,伦理学以道德为唯一的研究对象,这是使得伦理学区别于其他所有学科的独有规定性;其二,伦理学研究道德的全部内容,既包括关于道德的理论,也包括生活的道德实践,在这里,伦理学从来都是一个与道德生活实践有着高度同一性的概念;其三,道德是人的道德,只有“人”及其活动才具有道德属性。故伦理研究从来就是人对自身及其自身活动的“自研究”,是人对自身生活的自主反思与建构。正因为这样,伦理理念就不只是从“人应该做什么”“人何以为人”这些命题中引申出伦理、道德规范,而更要将这些命题与“专业的伦理学问题”“现实的伦理生活”结合起来探究,以“伦理学”的方式把握“存在”,以助益人们正视现实道德生活的丰富性、多样性、复杂性以及新的挑战,尝试以哲学·伦理学的方式理解、回应、解释并重塑我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

当下时代,我们所面临的道德事实是:在某种意义上,道德生活世界已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碎片化困局。阿伦特的“传统的断裂”“权威的丧失”与“超越的不可能”等对现代社会的预言已经成为显明的现实,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思。毫无疑问,这一现实也提出了当代伦理学研究的基本方向与使命,即伦理学研究应至少解决以下三个基本问题:其一,如何使人类在价值的多元中避免走向虚无主义;其二,如何探索共同体之中人的“好生活”;其三,如何在文化兴国、建设浙江文化强省与道德高地等实务中有所担当。

浙江历史悠久,钟灵毓秀,伦理思想丰硕。汉代王充引领了当时的批判性思想,并在某种意义上开创了浙江文化“重现世、致功用”的学风;有宋一代,浙江伦理思想逐成江南最具盛势之力量,朱熹、陈亮、叶适等人的思想交相辉映,他们每个人都在承望的意义上建构了自己的伦理思想,在中国伦理学思想史上有着极

其重要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各自思想建构中的交互激昂更是铸就了中国伦理思想史上最灿烂的文化景观;明以降至近代,浙江伦理思想不仅光耀中华,更是引领了有明以来中国社会的启蒙、改革与救亡的先声;王阳明、黄宗羲、章学诚、龚自珍等都在自身伦理思想的建构中化身为浙江学术与中国实践的先行者。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传统中国文化史中,浙江伦理学始终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主流力量之一。然而,新中国成立以来,浙江伦理学的发展却明显缺失了那种独有的锐利与魅力,与其经济发展、法治建设等领域的强势相比,浙江伦理学的发展却呈极不协调的后发态势。当代意义上的浙江伦理学的发展则要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末,这一发展伴随着反思“文革”和改革开放的进程而展开。不容否认的是,在30余年的发展中,浙江伦理学研究面向伦理实践,关注伦理思想的传承、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市场经济中的道德问题等,在元伦理学、伦理思想史和应用伦理学方面均获得了理论突破。然而,就全国范围来看,浙江伦理学界的话语仍相对较弱,特别是与北京、上海、江苏、湖南等伦理强省(市)相比,浙江伦理学界在学科建设、伦理研究、实践参与等方面尚有太多的欠缺。如何在研究队伍建设、学术研究的视野、内容、方法等方面致力革新,以及如何实现伦理研究自身化茧的同时实现伦理研究与本土经济、文化建设的互促互进已经成为浙江伦理学研究者所面临的重大而急迫的理论与实践任务。这一任务当然不是任何某一个人或任何某一个团体能在短时期内可以完成的,它需要浙江伦理学界长期的共同努力。值得振奋的是,在全国伦理学界前辈们的关怀与支持下,浙江伦理学人正振作了精神,勉力前行,且果累枝头。

基于此,浙江省伦理学会拟自2013年起,每年推出一部《浙江伦理学论坛》,其初衷有三:其一,以文字记录浙江伦理学的发展。在记录中呈现、反思伦理学者、学术、学科与时代之间的关联,旨在努力实现思想传播、理论创新与伦理践行的融合,以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呈现浙江伦理学研究近况。主要围绕着伦理学基础理论研究、中西伦理思想史研究、应用伦理学前沿、社会热点问题探析、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与浙江实践、伦理学与大学生德育、研究生论坛、新著简介、浙江伦理学研究年度综述、浙江伦理学名家访谈、浙江伦理学研究团队推介等设计、规划论坛主题,并不断探索浙江伦理学研究的新问题、新动向,完善论坛的内容,增强学术的丰富性。其二,构建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浙江伦理学论坛》拟动态呈现浙江伦理学研究的发展状况,本集作品多为浙江伦理学青年才俊之作,并不代表浙江伦理学的全部学者与实际水准,作品的集中更多的是旨在展现当代浙江伦理学人的伦理思考,并借名家访谈、浙江伦理学年度综述、学术团体推介等各

类栏目增进浙江伦理学研究者间的相互了解;论坛的深层初衷实乃期待学人能在动态呈现中把握既有研究的不足,在批评与反思中确立新的研究方向与方法的逻辑起点。其三,助力浙江文化强省、道德高地建设。理论研究固然当执守其自身的逻辑进路与学术品格,但这一理论同时也意味着理论研究须能为现实提供合理解释与有效解决思路借鉴与决策参考。在这个意义上,浙江伦理研究者的作为则在于为浙江经济、文化发展中的道德问题做合理解释,并为其有效解决提供决策参考,同时,亦须为现实道德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与方向指导。

是为序。

陈寿灿

2016年3月

目 录

生态伦理思想研究

-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两山”重要思想意义建构 陈寿灿 于希勇 / 001
- 走向生态福利主义的社会保障 汤剑波 / 013
- “垃圾围城”视野下的生态伦理反思与法治回应 季长龙 / 021
-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视域下县域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 以天台县为例 石怀春 / 030
- 复合联动：“五水共治”的机制创新与路径完善
- 缘于 Y 县的实证研究 林婷婷 陈 君 / 041

中西伦理思想史研究

- 王船山关于分配正义的论说 彭传华 / 055
- 儒家适度消费思想及其现实意蕴 安明霞 / 067
-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askēsis”
- 析穆索尼乌斯的教育观 于江霞 / 074
- 从浙商精神看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王洪霞 / 085

伦理学前沿与热点

- 道德动机、欲望与实践承诺 徐向东 / 090

论当代应用伦理学方法

——基于方法史的考察 郑根成 / 114

网络时代的“诸神共舞”与价值引领 李梦云 / 125

欲望、普纽玛与行动

——亚里士多德心理学对身心二元论的突破 陈 玮 / 133

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生成

——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 鲁明川 / 146

中国社会转型中知识分子的困境与突围 李梦云 周学堂 / 158

公民正义实践形式探索 刘晓璐 / 168

政治秩序的伦理意蕴及对国家治理的启示

——兼谈康德政治哲学 李金鑫 / 176

盖伦论如何避免悲伤

——兼析与斯多亚派之离合 于江霞 / 183

协商民主:价值取向与实践挑战 陈 婷 严国红 / 196

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公民教育的“DNA” 蔡志良 闫 闯 / 206

研究生论坛

浅析佛教宇宙论中的生态意蕴 于海腾 / 216

从生态伦理的视角看“五水共治”的付出和回报 冯 侃 / 226

儒家的共享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崔亚超 / 235

“公地悲剧”理论下对浙江“五水共治”的思考 方 正 / 244

道德自律唤醒“生态内因”

——以“五水共治”为例 胡丹丹 陈玲芬 / 251

疑“郭嵩焘之疑”

——兼论子思学源与荀子对孔子后学的态度 陈若宇 彭传华 / 258

附 录 2015 年浙江省伦理学研究成果一览表 / 270

后 记 / 286

◆生态伦理思想研究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 “两山”重要思想意义建构

陈寿灿^① 于希勇^②

【摘要】习近平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深刻阐述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辩证关系,从而形成了富有时代特色的“两山”重要思想。“两山”重要思想既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又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增添了新论断,创造了新理念,开辟了新境界。习近平的“两山”重要思想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并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之路,这在浙江也有着生动体现。

【关键词】习近平;“两山”重要思想;历史唯物主义

“两山”,即“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两山”重要思想,即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围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断形成的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思想的简称。“两山”重要思想的理论创造,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宝库。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历史唯物主义,他讲道: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

^① 陈寿灿,浙江工商大学教授,主要从事法治伦理研究。

^② 于希勇,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

开辟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两山”重要思想既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又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增添了新论断,创造了新理念,开辟了新境界。

一、“两山”重要思想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增添了新论断

(一)在人化自然与自然人化思想中增添了新论断

习总书记说:“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个论断,是“两山”重要思想的集中体现;这个论断,在人化自然与自然人化思想中增添了新论断。

在人类历史的辩证发展过程中,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始终是一个重大课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①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历史,是人化自然与自然人化的辩证发展史。人化自然表现为客观自然界不断进入人的活动的过程,亦即人的对象性活动在客观世界的展开过程。由于人的对象性活动,使得越来越多的天然生态系统变为人工生态系统的过程。自然人化包含外在自然和内在自然,前者是指客体世界为人所认识,而成为人类主体的工作对象;后者是指人类主体的理性世界,通过实践而从客体世界获得审美情感和审美体验。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人化自然与自然人化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人类的本质力量越来越在自然界中对象化;另一方面,自然界的力量、原生态的魅力越来越影响到人类内心世界的构成。在人与自然与时偕行的进程中,要在合规律性的同时合目的性,就必须达致“人化自然”与“自然人化”之间整体性平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论断,就是在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性思维中更加欣赏原生态的魅力、更加承认审美体验、更加强调“化入自然中”。

(二)在自然辩证法思想中增添了新论断

“两山”重要思想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断为核心命题,是一系列

^①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

精辟论断的生动组合。其中,包含着对“只要金山银山,不要绿水青山”行为的批判,包含着对“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的向往,也包含着“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的决断。习总书记从“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矛盾关系内部,洞察到对立统一规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个论断中肯定前者就是承认后者,从而在自然辩证法思想中增添了精彩的新论断。

自然辩证法是研究“自然”(nature)的辩证法,也是研究“天道”(Nature)的辩证法。在人类历史上,如何寻找“天道”即人与自然关系的“平衡点”,经历了相当长的辩证发展过程。在此意义上,人化自然与自然人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文明自我否定过程。在原始文明时期,有绿水青山,无金山银山;在农业文明时期,多绿水青山,少金山银山;在工业文明时期,多金山银山,少绿水青山。那么,根据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进行推演,接下来的文明必将是: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

然而,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是一对矛盾。人类社会要生存和发展,必须要改造自然——这也是自然辩证法的难解课题。然而,习总书记从“绿水青山”中发现了潜藏着的“金山银山”,这个新论断蕴含着大智慧、大觉解、大和解。

(三)在历史辩证法思想中增添了新论断

历史唯物主义将人与自然都理解为历史演进过程。如果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审视唯物辩证法,辩证法就不再是“变戏法”。我们也不应把辩证法单独地抽取出来进行论述,不应把它与它的抽象的承担者——与人的目的活动相分离的物质或自然结合起来进行论述,而是把辩证法和它的真正的载体——人类的生存实践活动结合起来进行论述。如是,唯物辩证法变成了历史辩证法。

作如是观,人类生存实践互动经历了否定之否定并不断扬弃自身的辩证发展过程。从野蛮到文明,构成了人类不可抗拒的历史命运。在人类历史实践中渐次展开,经过了辩证扬弃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正像一切自然物必须形成一样,人也有自己的形成过程即历史。”这段历史从古至今的演进,梳理如下——

表 1 人类演进过程

演进阶段	蛮荒时代	农业时代	工业时代
时代课题	生命危机	生存危机	生态危机
生存状态	打磨石器	种地打鱼	办厂做工
文明表征	本色文明	黄色文明	黑色文明

续 表

演进阶段	蛮荒时代	农业时代	工业时代
两山关系	有绿水青山 无金山银山	多绿水青山 少金山银山	多金山银山 少绿水青山
人类命运	艰难地生存	辛勤地劳作	拼命地赚钱

在当代,文明正在向后工业时代演进。我们逐步摆脱了“生命危机”“生存危机”,我们需要摆脱“生态危机”,也正面临着“存在危机”。因此,我们应该建设“绿色文明”,为“精神觉醒”的生存状态创设前提。由此,守住绿水青山,创造金山银山银水,成为合乎文明历史与逻辑演进的必然。在此意义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之所以是新论断,就是在历史辩证法中融入了命运关切、内心觉醒。

二、“两山”重要思想创造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理念

(一)“两山”重要思想在历史唯物主义中融合了中国传统生态文明理念

从历史与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华文明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在农业时代,中华文化实践传统中蕴藏着“天人合一”为主导的生存智慧。例如,“儒家生态伦理学思想作为儒家在理解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有机统一,是以‘仁’为核心,以‘亲亲’为基础,以‘爱物’为指向,以‘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为思想进路和关系原理的生态伦理学人文主义的思想体系”^①。

然而,传统文化中朴素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思想,建立在农业生产方式基础之上。这种“和谐”不时地被天灾人祸所打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在王朝的轮回中一次次自我复制。但是,“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中国历史遵循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实现了近现代的生产方式变革。

中国历史演进到当代,已经步入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两山”重要思想站在新的生产方式的高度,在与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的对接中,创造出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理念:“绿水青山”不仅是“小写的自然”(nature),更是“大写的自然”

^① 余卫国:《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核心价值和出场路径》,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Nature),是人生要符合人性、人道要合乎天道的自然——“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二)“两山”重要思想在历史唯物主义中融入了现代生态文明理念

习总书记说:“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作为重大民生实事抓在手上。要按照系统工程的思路,抓好生态文明建设重点任务的落实,切实把能源资源保障好,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将良好的生态环境视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是将人与自然视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是在将现代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历史唯物主义之中。如是,创造出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理念。

历史唯物主义本来就承认自然、大地、山水等物质资源的价值。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年)中指出:“土地是一个大实验场,是一个武库,既提供劳动资料,又提供劳动材料,还提供共同体居住的地方,即共同体的基础。”^①马克思认为: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②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西方文明囿于人类中心主义,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对等。从亚里士多德到罗尔斯,虽然在正义理论上卓有建树,但他们对正义的考量并没有将自然纳入。罗尔斯将正义理论奠基于自由平等的理性主体,自然并没有资格成为这样的“主体”。即便作为罗尔斯的反对者麦金太尔,虽然发出了“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的追问,但仍然搁置了对自然界生灵的关照。维特根斯坦曾言:“动物”之所以为“动物”,在于其被称为“动物”,一如人类。这个思想被麦金太尔进一步发挥,在其晚近著作《依赖性的理性动物》(*Dependent Rational Animals*)中得到了深入阐释。麦金太尔超脱了西方“人类中心主义”,提出必需从动物性中反观人类自身,承认人的脆弱性、依赖性与动物性。在承认

①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6页。

②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页。

依赖性的基础上,建构“给予与接受社会关系网络”,从而满足共同体成员需要,并将通达“共同善”(common good)、获取“共同善物”(common goods)作为价值理想。麦金太尔对“依赖性的理性动物”的论述,融合了亚里士多德主义与托马斯主义,借鉴了动物学、女性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语言哲学、交往行为理论以及后现代主义等思想,不仅丰富与发展了德性伦理学,也扬弃了“主体性哲学”与“人类中心主义”。^①

现代西方生态伦理学发展为系统化的生态伦理学理论:从“大地伦理学”到“深层生态学”,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环保行动到“绿党”,西方的生态伦理理论转化为实践。环境(生态)伦理思想方法可以概括为:“道德扩展的思维和论证方式,其基本观念是,道德应包含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伦理学应从只关心人扩展到关心动物、植物、大地,甚至一般意义上的大自然或环境。”^②西方环境伦理学的代表人物、被誉为“环境伦理学之父”的罗尔斯顿认为:“人类是一个有道德的物种,是地球上的道德监护人。人类应当从道德上关心其他物种,欣赏并尊重自然的内在价值。环境伦理学是最具有利他主义的伦理学,它真正地热爱他者,并把人类残存的私我提升为地球中的环境利他主义者。作为成熟的公民,我们每个人都应把这种环境伦理应用于自己的生存环境,从而诗意地栖居于地球。”^③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尔贝特·施韦泽提出“敬畏生命”伦理思想。也有学者基于此提出“后敬畏生命观”:从敬畏一切生命体的生命,尤其是人的生命的高度来强调环境保护和环境支持,“人们在处理一切与生命体相关联的关系,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过程中持有的以敬重生命、珍惜生命、关爱生命为价值评判原则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一全新的生命价值观强调生命至高无上性,敬畏一切生命体生命,提倡人的生命优先性,引领人们关爱自然、关爱人类、关爱社会,树立生态和谐观、社会和谐观和文化和谐观”^④。从英国哲学家 A. 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的“大地伦理”到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Arne Naess)的“深层生态学”,再到美国哲学家克里考特(J. Baird Callicott)的“两条二阶原则”(Two Second-Order Principles,简称为SOP),西方的生态伦理学日渐丰富并成体系。譬如,深层生态学批评了支撑现

① Alasdair MacIntyre: *Dependent Rational Animals*, Carus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② 李晔、苗青:《环境伦理学的理论方法、思想基础与论证逻辑》,载《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9期。

③ 杨通进编:《生态十二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10页。

④ 夏东民、陆树程:《后敬畏生命观及其当代价值》,载《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代工业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个体主义和还原论,赞同一种“形而上学的整体主义”:
“人基本上是其环境的一部分,他与其环境密不可分。人是由他与环境中的其他部分的联系造就的。在某种重要的意义上,环境决定着人的存在和人的本性,如果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不存在某种特定的关系,那么,人的存在将肯定是另外一种样子。”^①也有国内外学者试图站在跨文化的视野,以“大自然/生态/环境”为主体开展更高层面的对话——“以人与其它形式的生命及共同身处的环境(或简单地说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主题的神学论述,可统称之为生态神学(ecological theology)”^②。

可见,现代生态文明理念追求人与自然的全面和谐,强调在普遍平等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存共荣、共生和谐。

“两山”重要思想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同时将现代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历史唯物主义,从而将历史唯物主义立足于坚实的大地:在广袤的大地上实现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通过生产力发展彰显人的力量,在“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统一,实现人类共同体的持续繁衍生息与诗意栖居。如是,“两山”重要思想为历史唯物主义增添了“绿色”的浓墨重彩。

(三)“两山”重要思想内蕴着“美丽中国”实践的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美丽中国”的“美丽”,体现在“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交相辉映,体现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和谐变奏。“建设美丽中国”,就是通过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带动经济发展、政治文明、文化繁荣以及社会和谐——这是极具生存论智慧而又落实到实践的全新理念。

实践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历史唯物主义高度重视实践活动。“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在形式逻辑上是不能直接画等号的。但是在实践逻辑上,是可以画等号的——前提是正在从事实践活动。“两山”重要思想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根本上超越了西方生态文明思想以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两山”重要思想一方面继承了西方各种生态学说环境理论的合理因素(如库兹涅茨

① 何怀宏主编:《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07-508页。

② 赖品超、林宏星:《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生态神学与儒耶对话》,载《儒耶对话与生态关怀》,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85页。

环境曲线等理论),另一方面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活动破解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这一“两难”选择,从而阐明:只有从传统现代化向绿色现代化转型,只有走出中国式现代化之路,才是符合中国和平发展要求的正确选择。

综上,“两山”重要思想在中西生态文明思想互释中挺立,以中国化的语言方式和生存智慧,创造性地表达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发展逻辑,“美丽中国”是在实践中既坚持又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增添了崭新文明理念。

三、“两山”重要思想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境界

(一)“两山”重要思想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经济生态化与生态经济化的统一之境

经济生态化与生态经济化是辩证关系。这种矛盾关系不难在思想中克服,但是只能在历史实践中才能真正加以解决。“两山”重要思想具有世界历史视野,依托在历史实践中渐次展开的辩证逻辑。根据辩证法思想,可对“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关系诠释如下:

肯定:虽有绿水青山,没有金山银山;

否定:只要金山银山,不要绿水青山;

否定之否定: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

再否定: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

最终肯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在第一阶段是原始的、自发的生态文明阶段,这个阶段有生态,但是处在短缺经济时代。在此阶段,是多“绿水青山”、少“金山银山”,因为人类改造自然能力有限。第二阶段是用“绿水青山”换“金山银山”,但是较少关注环境承载力。在此阶段,虽然告别了“短缺经济”走向了“消费经济”阶段,但是为了经济的发展忽视了生态文明。在第三阶段则是对前两个阶段的双重扬弃,意味着要实现经济生态化与生态经济化的和合建构。这个阶段是自觉意识到生态危机的阶段。所以,当开采“金山银山”与保护“绿水青山”发生冲突时,舍前者而取后者,是为“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这个阶段也是自觉认识到“绿水青山”可以化为“金山银山”的阶段,所以种“常青树”就是栽下“摇钱树”,生态优势可以变成经济优势。

总之,“金山银山”,有良好的物质环境、充沛的物质财富以及富足的物质生活之意涵;“绿水青山”,有优良的生态环境、优质的生态产品以及优雅生态生活之意蕴。由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断,蕴含着经济生态化与生态经济化的和合建构,物质与精神的相互促进,以及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相辅相成——这呈现出历史唯物主义经济与生态相和合境界。

(二)“两山”重要思想赋予环境正义与环境审美的统一之境

习总书记说:“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人”与“山—水—林—田—湖”命脉相连、平等自由,这是多么精妙的环境正义思想,勾勒出多么富有中国画意蕴的“富春山居图”!

过去西方思想家并未将自然纳入正义的考量之中。因此,传统正义理论中正义与生态几无勾连,传统生态文明思想中也缺失正义关照。而现代生态文明思想注重环境正义,强调在人类和自然共存的背景下,人类的价值不应超越生态共同体的价值。因此,要实现环境权利保障与环境分配正义。在当代西方,已有学者依系罗尔斯等人的正义理论,提出环境正义论:“当人们的所欲超出他们所能够拥有时,包括环境正义这样一些议题在内的正义问题就产生出来。在这种至少有一部分人必须放弃他们想要的某些东西的情况下,立足正义原理的一个协议性的措施就具有了实际的必要性。没有协议,对稀缺物品的分配就可能取决于先到先得,人们可能会不择手段地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每个人都将生活在暴力与危险之中。”^①

正义是人类社会的首要美德,环境正义也应作如是观——“是人类面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新变化所作出的制度安排与权利配置。坚持以伦理为基础,是环境权利保障与分配正义的实现,是种际正义、代内正义与代际正义的统一”^②。恪守环境正义既是人类的生态美德,是人类在自然环境中的生命意味的体察,是在实践层面对环境美学主题的体现。正如美国新环境理论的创始者、“生态伦理之父”奥尔多·利奥波德在其所著的《沙乡年鉴》中指出:能有机会看到大雁要比看电视更为重要,能有机会看到一朵白头翁花就如同自由地谈话一样,是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不仅如此,“两山”重要思想还赋予了历史唯物主义以审美意蕴,更加强调人与自然的“气息相通”——审美的视界在于环境正义与生态文明相统

^① [美]彼得·S.温茨:《环境正义论》,朱丹琼、宋玉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② 陈寿灿:《宪政伦理视野下的环境正义》,载《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3年第7期。

一。可见,“两山”重要思想阐扬了生态文明美的价值,注重人民大众的环境权利保障,彰显出环境正义与环境审美相统一的理论新境。

(三)“两山”重要思想开辟了生态文明理论与生态文明实践的统一之境

生态文明建设是理论,更是实践。认识真理永无止境,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习总书记走遍中国,可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破万重关。正是在理论与实践的复合建构中,习总书记坚持、发展而又践行着历史唯物主义,从而开辟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说:“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①习总书记说: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要融入现代元素,更要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

历史唯物主义见物也见人、见物更见人。人生的意义世界不全然是功利的,还有超功利的一面。人生除了劳作,还需要终极关怀。人生劳作与关怀的合一,就是在对象性活动中确立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在此意义上,人都有挥不去的乡愁。乡愁是诗,是文化,是人的情结,是人的境界……乡愁既挥之不去,也不可避免,在实践意义上应该“重建”。“绿水青山”蕴含着生命的自然维度,“金山银山”蕴含着生命的社会维度。人类正是在自然维度与社会维度的张力中,不断扬弃原有的生存方式,辩证展开着自身的生存向度。“记得住乡愁”,就是人性的辩证回归,就是人类的历史回归,就是在思想感情上守望我们共有的家园,就是在实践活动中“诗意地栖居于大地”——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生态文明实践的统一之境开启。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已经在变化的“现成世界”之中,人的一切感觉来自人化的自然界以及人化的社会(世界历史)。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Ⅲ)中做出论断:“不仅五官感觉,而且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两山”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3页。